

## 第一章 “岛国根性”与地缘文化和教育

在日本，偶尔会听到日本人用“岛国根性”一词来推诿或概括本民族常被外国人所指责的一些性格特征，例如，心胸狭窄、语言暧昧、吝啬小气、自大排外、生性多疑、功利主义和自私不仁等，似乎这些特征是岛国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实际上，日本人并不经常使用“岛国根性”一词，只有当 they 与外国人讨论日本的国民性并受到正面指责时，他们才会含糊其词地用“岛国根性”一词来暗示对方谈话就此终止。对日本人来说，交谈中的弦外之音是谈话的最高艺术；而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观点则有碍于日本人视和气和生命同样重要的面子。

日本常被指责的上述缺点恰当与否姑且不论，人性的弱点依其对立面的优点而存在，则似乎是可以推断的事实。依此推论，作为日本人上述诸弱点之对立面的优点还应包括：处事慎重、人际和谐、勤俭节约、合作意识、自我保护、避虚务实和循规守法等。把日本民族的上述性格特征完全归结于与世隔绝的“岛国根性”，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同样是岛国的大不列颠英国却没有形成与日本相同的民族特征之事实，可谓是恰如其分的反论。

从地缘文化学的角度来看，地理环境是形成民族性格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球为人类生存所提供环境的多样性，使各国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的差异。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产物。自然环境可谓是凝固的文化符号。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环境一直被作为人类的对立物，处于人类的“他在”分析自然、征服自然，成为科学思想的起源和动力。同样，日本特殊的岛国环境以及日本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也是把握日本文化和教育的关键。

## 第一节 国土与国家

日本人的成长，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理位置、气候和自然条件等因素。在科学技术水平有限的古代，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着日本人发展的程度和具体方向。即使在科技高度发展的今天，日本人“不求征服求调和”的自然观，对日本人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据研究距今 170 万年前，在东亚大陆上已有原始人类的存在。远古时代的日本与东亚大陆是有陆路相连的。只是在后来，海水上涨，日本列岛才与大陆分隔开，使日本成为一个与东亚大陆分离的列岛。目前，日本列岛的面积是 377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的二十五分之一。世界各国的大多数人都把日本看作是一个国土狭窄的小国家，甚至日本人也持有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日本的国土的确狭小，从日本列岛的任何内陆中心到海岸的直线距离都不超过 120 千米。其二，从比较的角度来看，日本处于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四个国家的包围之中，西北面是俄罗斯和中国，太平洋的彼岸是加拿大和美国。其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言，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其国土面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把日本与欧洲各国作一比较，则日本不应被看作是一个小国。它的面积比意大利要大得多，相当于一个半英国那么大。

用通常的世界地图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大小，是人们已习惯的通常做法，它判断的往往只是国土的绝对面积。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传统的“国土即为国家”的概念似乎已经陈旧。“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空间，伴随着其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已超出“国土”的范围渗透到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平方公里，似乎再也衡量不出国家的大小；地图，似乎再也描绘不出国家的界

限。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德温·O·赖肖尔(Edwin·O·Reischauer)在《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The Japanese Today: Change and Continuity)一书中就曾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两个方面绘制了日本与世界各国的比较地图。

这两幅地图是他在1964年设计的,并且在以后又作了修订。虽然这两幅地图的年代已经陈旧,但它们却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更好地了解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尽管从这两幅地图上我们很难估计出精确的数据,但是其直观性仍然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当今世界的现状。它表明,尽管日本的一亿二千万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左右,但是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却约占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从这两幅地图中还可以看出,世界的人口大都集中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及非洲和南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而世界的生产力却高度集中在欧洲、北美和日本。

日本处在一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之中四面环海,海岸绵延。境内火山纵横交错,山中森林密布,溪谷、河流众多,但流域狭窄且落差大,无法用于船舶航运。在南北狭长的地形上,从亚热带景观到亚寒带风土兼收并蓄,四季变迁非常明显。由于整个国土山地多,平原不到国土的五分之一。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众多的山谷间狭小的平原上。事实上,除香港和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外,日本在每平方公里可居住面积上的人口密度和生产率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高。

日本最大的平原是位于东京周围的关东平原。东京,从前称为江户,在1700年前后大约有一百万人口,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现在,东京及其附近的川崎、横滨和许多四周的卫星城约有1500万人口,是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以大阪为中心的

[美]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詹森著:《当今日本人——变化及其连续性》孟胜德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5~6页。

关西地区，又是一个大都市地区。大阪与附近的京都和神户等市拥有约 1200 万人口。关西地区意为关之原以西，是可与东京周围的关东地区（关之原以东）相匹敌的大都市区。位于关东和关西之间的名古屋市是另一个人口超过 200 万的主要都市，闻名于世的丰田汽车公司就位于名古屋附近的丰田市。日本的工业主要密布在约占全国面积五分之一，并在日本历史上有一条古老的交通干线的平原地带。这条工业线从以东京为中心的川崎，横滨等城市，向西经过以名古屋为中心的许多卫星城市，再通过以大阪为中心的京都和神户的关西地区，一直延伸到本州南端的广岛和九州的福冈和长崎为止。这条工业线类似于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是日本工业的心脏地带。沿线工厂和现代化的建筑物及交通要道连绵不断，只是在有的地方被小块的农业区和山脊所隔断。这条沿海地带聚集了日本的大多半工业，居住着将近一半的日本总人口。

除去罕见的平原之外，日本大部分地区都是绵延不断的山岭，其间交织着狭长的山谷，在这些山谷的盆地里，开垦出一条条狭长的耕地，居民点也坐落在耕地的附近。这种自然的隔离状态助长了日本近代以前的地方分裂主义，也为中世纪时期分散的封建割据政权提供了条件。到 8 世纪时，日本根据这种自然的隔离状态形成了 68 个州。日本现在 47 个都道府县的边界，十分之九仍然是沿用早先这些州的山岭作为分界线。尽管日本被自然地形所隔离，但是日本仍然是一个统一而单一的民族国家。在当今世界上，像日本这样人口众多而又属于单一民族的情况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

像世界上的其他农业社会一样，日本人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对养育他们的有限的可耕地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尽管日本目前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人仍然把自己的国家看作是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这种地缘上的自卑心理，可能是促使日本人始终关注“岛外大世界”的动力之一。在外国人看来，日本人宣扬本国国土狭小的程度几乎达到了夸大其词的程度。翻开任何

一本日本的中小学地理、公民、国语等课本 都会有“日本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描述。而正是这种耳闻目濡式的教育 使日本人形成了珍惜有限国土的共识和民族生存危机的认同感。

## 第二节 自然观与农耕文化

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日本的基本产业属于自然产业，即农业和渔业。在以自然产业为主的社会中，自然环境如何以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水平如何，对产业的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日本境内山脉纵横，城市和交通网日趋扩张，耕地面积不到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相比较而言，由于日本的山脉比较年轻，土质也不是很肥沃。但是由于植物的生长季节较长，加上雨量充沛的海洋性气候，更由于日本农民的精耕细作和高度发达的农业技术，所以尽管耕地面积狭窄，日本仍然是一个农业产量很高的国家。

对自然的认识如何，往往决定着利用自然资源的水平。在日本“自然”一词与中国的写法相同，它最初来自于中国的经典《老子》。老子用“自然”这个词表述他崇尚虚静无为的处世哲学。由此看来，“自然”的本意是指人的处世态度，而不是指天地山川、花草树木等外在于人本身的自然现象。对于古代日本人来说，天地山川均是个别的存在，并不笼统地构成自然。在他们看来，所谓“自然”并不意味着天地山川那些“对象性的事物”，而是意味着未经人工改造的“状态”和天地山川“原有的方式”<sup>①</sup>。只是到了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方“nature”（自然）一词的引进，“自然”才有了外在的普通含义。今天，人们虽然仍将未经人为加工的状态和事物称为“自然”，但是严格地说，“未经人为加工”的“自然”几乎已荡然

冯玮著：《日本的智慧·大和民族的乐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6页。

无存。甚至人类本身，在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时，也被纳入科学研究的范畴。确切地说，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文化是第二自然。现在，“自然”一词似乎已成为概括外在于人类自身所有自然现象的专有名词。

在西方，按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神创造了天地，然后又创造了动植物，最后以自己为“模特儿”创造了人类。被人格化了的神是居于自然和人类之上的，而人类和自然则是作为彼此独立的客体而存在的。从古希腊时代起，西方人就一直把自然万物视为人类的对立面，通过分析自然和征服自然而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对西方文化的发展和扩张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受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加上日本独特的自然环境 日本人形成了一种“不求征服求调合”的自然哲学观。“日本人同自然具有一种亲和一体感，这种一体感和西方人将自然视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主要表现在是和自然对抗还是顺从自然。无需赘言，以农耕生产为基础，身处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经常满怀深情地观察四季变化状况的日本人，蒙泽于自然的恩惠，对自然产生亲和一体感是合于情理的。”<sup>①</sup>但是 日本的“自然”又存在台风、地震和火山，加之日本的山脉又比较年轻，暴雨之后，滑坡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因此，“日本人对自然的亲和一体感，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感情，而是混杂着种种复杂的感情。概括地说，日本人对天和地具有一种敬畏和恐怖感，对动物和植物具有一种同胞和兄弟般的感情，对小鸟、花草等比人类弱小的生物，具有一种对待弟妹和子女的感情。也就是说，日本人对自然的感情 交错着敬畏、恐怖、感激、亲爱、可怜、娇宠。这是

冯玮著：《日本的智慧》和《民族的乐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259页。

一个母性的 而不是父性的感情。’<sup>①</sup> 在日本人看来，科学的意义在于如何利用自然，使人生与自然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由此看来，西方的征服自然与日本的调和自然，其自然观的出发点和目的是全然不同的。试图征服自然，多会遭到失败，而力求调和自然，虽然也会失败，但因不破坏自然规律，因而不会遭到自然报复性的惩罚。总之 在日本人看来 自然是“生成”的 其自身具有规律性的生成力 为那种生成力提供帮助 使之更好地“生成”即是人类的工作，也即是文化。人类不是自然的支配者，而是帮助自然进行工作的同伴乃至同类。

日本人“不求征服求调和”的自然观 在对气候的观测方面 也显示出一种探隐发微的文化才智。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前，自然产业是日本社会的主要产业。在自然现象中被称为“气候”的大气变化，始终对作为自然产业的农业和渔业收获乃至生命安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日本人在很久以前就十分注意气象变化，发现气候变化的规律。近代以前的日本历法虽然沿用了中国 24 节气的区分法，但日本人根据日本海洋性的气候特点，又将 24 节气细分为 72 候，5 日为一候，每一候中都有动植物和自然景观发生相应变化的征兆<sup>②</sup>。例如，春夏秋冬的节气变化是这样描述的：立春 东风化冰 蛰虫动 打鱼谨防落河中 立夏 蝼蛄叫 蚯蚓出 黄瓜生 立秋 凉风吹 露水降 寒蝉鸣 立冬 水成冰 地结冰 野鸡入水变文蛤。掌握这些自然现象，对于预测天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植物和动物出于一种生物的本能，对气候的变化极为敏感，是天然的“气象观测仪”如果气候异常 它们必然会作出反应。即使在气

冯玮著：《日本的智慧 大和民族的乐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第259页。

② 冯玮著：《日本的智慧 大和民族的乐章》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第116页。

象预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的农民和渔民仍然参考和沿用 24 节气的自然规律。

把 24 节气细分为 72 候，是日本人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的经验总结。这种观察细微精确的智慧，在中小学的课程中也得到了体现。留学日本期间，爱知县的一所小学曾邀请包括笔者在内的各国留学生参加小学 6 年级的一堂综合活动课。在开始活动以前，我们共同观看了该校学生们 10 年来对该社区在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的节气里拍摄的关于自然现象变化的实况录像。由于这一天是立秋的日子，任课教师提示学生们重点掌握 10 年来立秋这一天自然现象的变化。教师解析说，“凉风吹”主要是指气候温度的变化情况；“露水降”主要让学生考察本社区植物的分布情况；“寒蝉鸣”是指本社区动物的种类和分布情况。然后，学生们被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到该地区的不同地方去观察“凉风吹、露水降、寒蝉鸣”等自然现象。学生们有的边观察边作记录、有的边摄像边讨论。实地考察结束后，教师让每个小组的代表作总结性发言，然后各小组进行对比。最后，教师把各小组的报告、照片和录像等进行全面的总结，作为永久性的资料来保存。学生们得出的大致结论是由于大气污染、城市扩张和地球温暖化等因素的影响，该社区的动植物种类与 10 年前相比减少了许多。其中有个到过中国云南的小学生甚至充满感慨地说，与中国相比，日本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农村和自然。他的发言使同学们认识到了保护该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据说，在下一次综合活动课里，学生们还将通过计算机网络与日本其他地区的学校联系，交流相互间的观察结果。

这是一次典型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相结合的综合活动课，通过实地考察、数据统计、报告撰写、课堂讨论和成果公布等教学和研究环节，学生们不仅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和环保意识，而且还学习了自主性研究的基本方法。参加这一次活动课的欧美留学生对日本同时采用历法中的公历和农历表示不解的同时，更多的

是对 24 节气中自然现象变化的精确性表示震惊。在场的中国留学生除对自己的祖先发现 24 节气感到自豪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中没有设置这样的传统文化课而应该感到遗憾吧。

有人认为，在古代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中国北部地区的大型水利工程，使得这些地区形成了一种规模巨大的专制主义社会。的确，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建立在集中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明国家。国家的统一和集权，是建设灌溉和排水工程以及用于交通的巨大运河网络的结果。所有这些，使得农作物生产有余，而对于剩余农作物的集中和再分配，则决定了政治力量的集中。自宋代以来，中国文化的重心及其扩展的主导方向，始终是朝着南方推移的。由于南方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因而很容易由中国农业文化所产生的高度集权系统得以实施，所以向南的扩展几乎没有碰到什么障碍。由于中国北方在生态上的巨大差异，特别是草原地区缺水状况，使它只能发展畜牧业，而不能汇同于大河流域的大一统农业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向北的扩展始终是缓慢的。<sup>①</sup>

纵观历史，中国不断被来自北方边境地区的草原游牧民族所侵扰和征服。但是，无论部落文化向南渗透得多么遥远，结果终归导致了入侵者的中国化。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是一回事，但是要用游牧文化征服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国农业文化却是不可能的。最终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不能被统治于马背上”<sup>②</sup>

日本的自然环境与中国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日本山脉纵横，耕地面积狭小，无法经营大规模水利工程。日本的农业所需要的只是小集体之间在分享水源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多少世纪

<sup>①</sup> [美]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 韩建军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68页。

<sup>②</sup> [美]托马斯·哈定等著：《文化与进化》 韩建军等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第68页。

以来，这种协作精神也许使得日本人显著地具有一种善于区分“我们”和“他们”的团体倾向。

农业知识传到日本相当晚，大约在公元前二三世纪时，日本才开始有农业。古代中国的北方是许多东亚国家文化的发源地，它的主要农产品是旱地产的小米等。然而最早传到日本的农作物却是水稻，据说是从中国南方地区传入的。水稻种植的传入，使日本跨过靠打猎和采撷为主要的时代，走进了以农业为主要的时代——即所谓的弥生时代。到公元8世纪除北海道以外，日本所有的温带地区都在不同规模上种上了水稻。

长期以来，稻米和日本文化有着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日本的水稻是在水田中耕作的，由于水中含有天然的营养成分，即使不施肥，也可以进行连续耕作，从而可以养活众多的人口。这与每年必须在可耕地里改善耕种作物，实行轮作的古代欧美和中国北方等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日本的可耕地面积狭小，但是由于水稻种植拥有的优越性，所以日本的粮食基本上能够实现自给自足。

在农业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的水稻种植从播种到收获都实现了机械化。而在古代，所有的农活都必须由人工来完成。水田一旦停止耕作，立即就会被杂草所吞占。为了确保丰收，必须将杂草除掉。这意味着水稻耕作不仅是农业，而且是园艺。而园艺式的工作是不能由家畜承担的，一切农活都得由人来干。所以，日本人自古以来都特别注重勤劳和精工细作的工作态度，或许正是“无论是什么都必须由人类来完成的日本人的以往经历，在这里投下了影子”<sup>②</sup>。另一方面，为了在有限的可耕地上获得高产，家

公元前3世纪，日本进入了弥生时代。弥生文化是由发现弥生式陶器的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而得名。——作者。

<sup>②</sup> [日] 井上靖等：《日本人与日本文化》周世荣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91页。

庭成员必须齐心协力才能完成。日本人认为，只有在家庭般的氛围中，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勤劳刻苦的精神。今天，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几乎所有的日本企业都刻意营造一种温暖的氛围——既长幼有序，又人际和谐。追根溯源，可以说这种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就是从传统社会的农耕文化中逐渐演变而成的。

同样，在日本学校的课堂教学中，也洋溢着家庭式的温暖。我们知道，日本的小学在三年级以前，各个班级一般只有一名教师担当所有学科的教学任务。虽然这种模式有教师负担过重和一名教师不能胜任所有学科教学任务的弊端，但是它也有其不可否认的优点。担当教师就像一家之长，能够了解班级里的每一个学生。由于担当教师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一般是不更换的，所以师生之间的感情纽带始终是牢固的。对于从学龄前已经习惯于家庭温暖的日本学童来说，入学以后能顺利地进入课堂中的另一种温暖无疑是有利的。

家庭中的长幼之分在教育中也体现出文部省对地方教育机构的权力统制和师生间森严的等级关系等方面。明治维新时期设立的文部省，始终以贯彻各个时期的国策为己任，试图统制全国各级各类教育。尽管在战后被占领时期里，日本教育进行了地方分权的民主化改革，但是，时至今日文部省权力过于集中的怨声仍然不绝于耳。在占领时期，美国根据地方分权的思想，对日本的教育行政进行了改革。按照美国人的设想，教育是地方所经营的事业，文部省应该是一个指导和咨询性的机构。但是在 50 年代前期美国占领结束以后，作为修改在占领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的一环，日本进行了教育行政机构的改组。在中央一级改变了文部省部局编制的原理，权限逐渐被集中的同时，把占领时期由学者出任文部大臣（“学人文相”）的体制换成了由政党人士出任大臣的制度（“党人文相”）。另一方面，各地区战后教育行政改革的核心——教育委员会制度也被改组。占领时期公开选举产生的委员，被改成由地公共团体的最高领导人任命。这样，教育委员会对于其他一般行

政部局所具有的权限的独立性被削弱了，而对文部省的从属性则加强了。时至今日，日本教育行政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仍然是教育改革的焦点。这种倒退式的改革，追根溯源，可以说是日本长期以来在农耕文化中形成的家庭式管理模式在教育中的某种体现。

### 第三节 隔离状况与岛国根性

在日本中学的公民课本中 有这样一句话：“从全球着想 从身边做起”(thinking globally, acting locally)<sup>①</sup>。这句意味深长的口号，表达了作为普通公民的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的确，作为一个与世隔离，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始终离不开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正如日本人经常所说的那样，日本的唯一出路是“加工→出口”。这既是日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基本国策，又是全体日本国民的共识。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日本人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可以说达到了一种偏执的程度。她始终以敏锐的眼光，审视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其他国家任何细微的变化和偶发性事件 都会被大众传播媒介“炒”得沸沸扬扬。日本国民正是通过言论自由的大众传播媒介来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并达成共识的。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传播媒介似乎总是从忧患的角度把日本与外部世界作以比较 有意识地提醒和强化某种民族危机感。

作为个体公民的日本人，正是“从全球着想”的角度，获得其日常生活中的动力源泉的。“从身边做起”，可以说既是日本的文化观，又是日本人的生活哲学。空泛的道德说服，对于日本人来说，不啻于浪费生命。他们相信，只有行动，方可创造灵魂。空泛的形式主义会遭到日本人本能的抵触。例如 20 世纪 90 年代中

[ 日 ]田边裕、吉田孝编：《新社会公民》 东京书籍株式会社 平成 10 年 2 月 第 214 页。

期，日本国会通过的国歌、国旗法，就遭到了日本教师组织和学生们的普遍批评和反抗。反抗的理由无非有两条：其一，日本的国歌“君之代”和国旗“日之丸”产生于明治时代，它们曾是日本侵略亚洲诸国的象征，不利于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并且会遭到亚洲各国人民的反感。其二，日本人认为，通过唱国歌，据说，绝大多数日本的中小學生都不懂得国歌的含义，因为它的歌词是用明治时代的语言写成的，晦涩难懂。和升国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真正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表现于爱家庭、爱班级和爱社区的具体行动之中。因而，尽管国歌、国旗法业已公布实施，但是真正执行的中小学却寥寥无几。

“从全球着想，从身边做起”作为一个口号也许不是日本人的首创，但是它却成了日本人日常生活中的准则。从日本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来看，这种生活哲学观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产生和形成的。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的主要岛屿距离韩国有一百六十公里以上，与中国也隔着七百多公里的海面。在航海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里，这无疑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在16世纪出现航海贸易以前，日本只同两个邻海国家中国和朝鲜有交往，其他国家的影响也都是通过这两个国家才传到日本。在历史上，日本的统治者利用地理上孤立的状况，曾经强行推行一种与外部世界隔离的锁国政策。从1638年到1853年的两个多世纪里，日本除在长崎等沿海城市保留与荷兰和中国的贸易和文化交往以外，几乎断绝了与所有其他国家的一切来往。可以说，在西方诸发达国家加速发展国际关系和殖民扩张的年代里，日本的闭关锁国是一种极为有趣而独特的情况。

西方文化，尤其是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是导致日本在17世纪前期实行锁国政策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从15世纪下半叶起，西欧大西洋沿岸各国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海上冒险和殖民远征。这场大航海运动，拉开了世界历史转折的序幕。葡萄牙和西

班牙是西欧海外扩张的急先锋，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君主、贵族和商人亟图向海外寻求土地和财富，而且更因为它们兴起较晚，地中海贸易和北海贸易已为意大利人、德国人和英国人等所垄断，它们只好另谋出路。天文年间（1532~1554）日本被葡萄牙人发现；其后，天主教也随之被传到了日本。欧洲人的到来，以及天主教的传入使日本人大开眼界。过去日本人所认识的世界只是从中国大陆到印度的地区，现在日本人知道了还存在着遥远的欧洲世界。从此以后，西方文化随着天主教传入日本，使日本人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是，对于日本的统治者来说，强调绝对统治的封建社会伦理道德，与强调国家政权隶属于超国家教权下的外来宗教思想意识，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融的。同时，西方宗教传播的基础——西欧商业资本所暴露出来的殖民地性质，也给日本统治者直接带来了政治威胁。另外，天主教（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称为基督教或耶稣教）是一神教，只信仰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上帝），反对崇拜偶像和祖先，主张神权高于君权。这与日本自古以来崇拜君权的原有信仰迥然不同。日本人信仰佛教、儒教和神道教，崇拜偶像和祖先。因此，通过天主教带来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信仰、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与日本固有的价值观必然要发生摩擦和冲突。因而，日本的统治者借机实行锁国政策也属预料之中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日本与世隔绝的自然条件以及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的锁国政策，使日本人比亚洲其他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和国家更有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寻求独特的发展道路。从历史上看，两个世纪之久的锁国政策，使日本人有机会对在此以前从中国借鉴来的传统文化进行充分的吸收和利用，形成了有别于中国和朝鲜这两个邻国的独特文化。经过“明治维新”改革以后，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实现了富国强兵和脱亚入欧的目的，但在文化上却仍然完好地保持了“和魂”特色。正如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埃德温·赖肖尔在分析日本的自然和人为的隔离状态时所指出的那样：“与

世隔离的状态也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副产品。它使得别国人民，甚至附近的朝鲜人和中国人，都感到日本人与众不同。它使日本人具有一种强烈的个性感，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在别人面前令人难堪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很难用什么尺度来衡量，但他们总是用很强烈的‘我们’和‘他们’这种二分法来观察世界的其余部分 包括同他们在文化上，种族上都很密切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整个历史上 日本人在区别‘外国’输入的事物和地道的‘本国’事物方面，几乎有一种偏执狂。”

有的学者认为，“内外有别”是日本人最基本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是长期以来稳定的农耕社会的产物。年复一年地在有限的可耕地里栽培水稻，是日本农业的一种特征。当日本人在水田里收获水稻时，他们不能不感到祖先为后辈开垦土地的恩惠，从而对祖先充满敬意。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为了让自己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这种恩惠，他们必须勤奋劳作。这样，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后代关心的观念相互交织，形成了一种纵向的彼此之间珍视对方的精神结构。这一事实，使日本人同家族以及养育自己的土地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一种人与乡土的“亲和一体感”。这一点和以“择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是迥然不同的。游牧民族往往因自然条件和季节的变化而四处迁移，并且对新的生活条件不时地进行调节。但农耕民族则是以占有一定的区域为基本生活前提（尤其是在山脉纵横的日本），他们只能尽力使自己的生活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

日本人的乡土亲和一体感，和作为日本人人际关系和社会集团关系基本结构的“内外有别”观念是互为表里的。日本学者喜多川忠一认为 强调‘内部’和‘外部’是显现于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中的日本人最基本的特征。他指出，自古以来作为日本人之特性的“义理、人情”以及被视为日本人基本价值取向的“集团主义”、“集团指向”都可以和必须在“内部”和“外部”的关系中加以理解。<sup>①</sup>日本人的“内部”和“外部”观使日本民族作为一个文化群体，形成了一种封闭的性质。它在社会等级的层次上导致集团丛生，集团之间内外有别，竞争激烈；在社会心理的层次上则促成并强化了日本人的群体意识，即对内聚合，对外排斥。

迈克尔·迪布丁在《死亡环礁湖》一书中曾经指出：“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自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sup>②</sup>的确，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似乎也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蕴涵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真理。目前世界诸发达国家和民族，在历史的某个时期都曾对其他国家进行过殖民扩张和侵略。日本民族强烈的群体意识，以及对内聚合、对外排斥的倾向性，在和平的时代里也许是日本取得经济成功的原动力，但是在军国主义时代里，也曾是殖民扩张的罪恶根源。“对内聚合”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对外排斥”却是日本民族常常遭到世人谴责的把柄。然而在日本的文化中，二者似乎是互为表里的一个整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外排斥”也并非是完全消极的。因为在日本，这种排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促使群体中的个体为了群体在对外竞争中取得优势而付出的某种努力。同时，“内外有别”使日本人对外部具有异乎寻常的观察力，使他们善于模仿，

[日]喜多川忠一著：《考察日本人》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3年，第109页。

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版，第4页。

乐于吸收和学习外部世界的长处。正是“内聚”和“排他”这两股互为表里，互相消长的力量，使日本人成为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民族。

综上所述，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人为的锁国政策以及独特的农耕社会等因素，使日本民族形成了诸如群体意识、内外有别、对内聚合和对外排斥等基本的性格特征。这些特征的有机结合，是日本人积极摄取异邦文化之精华，发展本民族文化和教育的原动力。七世纪的大化革新和十九世纪的明治维新就是日本人齐心协力借鉴和赶超中国和西方诸国文化教育的历史性改革。二战以后，当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之后，日本又制定了争作世界政治和文化大国的目标。早在1953年，日本文部省就通过修订学习指导要领，呼吁大中小学发展国际理解教育，即培养“世界中的日本人”。当时国际理解教育的宗旨是：①培养学生对日本文化和传统的兴趣；②培养学生对世界史和文化的理解。在50年代和80年代修改后的学习指导要领中，特别强调了在学校教育中，尤其在社会科、地理、历史学科中增加了“世界史”的内容。

近年来，国际理解教育的重点放在“异文化教育”方面，例如重视外国子女、归国子女以及包括在日的南北朝鲜人、留学生的教育上。文部省试图通过本国师生对异国文化的理解，以及通过与他们彼此的交流，促进日本教育的多样化发展。由此，目前在日本的都道府县中，不少高中、短期大学、大学纷纷开设了诸如国际文化科、国际政治科等课程，与国际教育有关的学科多达38门以上，与前10年相比增加了三倍多。①可以说，日本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出发点是试图改变日本人被戏称为“经济动物”的国际形象，最终目的却是争做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大国。

留日期间，爱知县一所小学曾经邀请笔者观摩小学三年级的

朱永新、王智新主编：《当代日本教育改革》，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第160页。